

百年激荡：中美关系的世纪回顾

● 孙 哲

20 世纪是一个“神奇的世纪”。其万千经纬，漫卷风云常让世人感慨人类不断追寻梦想、讲求时效、求新求变的巨大能量以及由此创造出的辉煌与极致。1900 年时，世人因第一辆电车、第一架飞艇、第一道无线电波而产生无限的惊喜；而到了 2000 年，嘈杂繁华的车流淹没了世界发达一角，私人登月旅游不再是天方夜谭，因特网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沟通形式，整个世界被更大的能量和推动力所驱使，飞跃着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兴衰无定，祸福相依。人类以战争揭开世纪序幕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以争取全面和平和全面发展作出了历史的回应。中美关系正是如此曲折复杂的事变迁的折射。百年激荡中寒暖相间，两国交往走过了极为复杂、极为壮阔的一段历程。

一、百年间中美关系的演变： 三重视角

我们可以依赖三重视角来回顾百年间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

第一重视角：20 世纪的国际舞台接连上演了强权迭起、两极争霸以及后来世界多元化的连天烽火，中美关系的沉浮随世界历史的积淀而逐步演进。

简言之，世纪初，社会主义的号角曾经吹响了 20 世纪的最强音。十月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世界，改变了整个时代的面貌。但在经历了 70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自我解体；世纪中，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使得人类最终埋葬了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催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分化和大改组；世纪末，民主已经成为全球不可抗拒的洪流，世界在向霸权政治开战，主权平等、观念平等、文明共存，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矛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第二重视角：中美两国本身经历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践的巨大洗礼，同样奠定了双边关系演进的历史基石。

美国在 20 世纪初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其时间之短，争霸范围之广，大有在一个国家建成“人间天堂”的气势。一战胜利后，“在差不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世界领导权已奉献给美国”。二战被许多学者视为“美国世纪”到来的前奏。相当长

一段时间里，美国长执国际牛耳，睥睨于世，独步一时。特别是 40 年的冷战，使它最终得以傲视群雄，成为唯我独尊的“寂寞霸主”（The lonely superpower）和所谓的“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The indispensable nation）。但是美国对自己利益的制约采取“宽容的忽略”以及对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利益的“恶意的忽视”，使它又难以摆脱霸权衰落的阴影。这个“掠夺性的霸主”在 20 世纪末已难有当年那种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如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the declining）成为美国内政外交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

相比之下，中国从任人凌辱的封建王朝走向了有自己特色的富国强兵道路。世纪初，中国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反清灭洋”、“扶清灭洋”，反而惨遭镇压，八国联军一路追杀，中华大地血流成河，文明扫地。世纪末，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神话”。短短 20 年里，勃兴的上海、回归的港澳，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签订，都充实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

第三重视角：中美关系起伏动荡而又利益交织，使得百年来，特别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曲线的运行状态。

1783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成功，大大推动了两国之间的交往。但闭关锁国、贫穷落后的中国被迫在 1845 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美《望厦条约》，以此作为对“仰戴天朝恩德”的美国的“优加褒奖”。^①殊不知，19 世纪美

^① 转引自席永君、马再淮编著：《超越美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4 页。

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已使它迫切需要在海外进行扩张。美国政府在 1899 年和 1900 年两次提出列强在中国“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原则。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救世情怀和“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道义感，美国人走上了在华掠夺扩张的道路。一方面，在面临法西斯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背景下，美国慷慨地通过了《租借法》，在 1941 年到 1945 年间给了中国 13 亿多美元的资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罗斯福总统在当时的演说中还声称：“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在抗拒敌人的宰割中显示出同样伟大坚强的意志。……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我们的帮助。”^① 对此，毛泽东在 1944 年致罗斯福的信中也热情洋溢地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您的努力与成功，中美两大民族将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惧怕和对“赤色中国”的误解，又使得美国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无所不用其极地遏制、孤立和封锁中国。后来，中国自身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两国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才使中美联手共同抗衡苏联成为“大势所趋”。尼克松最终认识到“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已经没有地方能容纳下 10 亿潜在的最能干的人民生活于孤独的愤怒之中”。中国也在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与作为“宿敌”的美国接近和交往。

^① 熊志勇著：《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46 页。

二、“既爱又恨”的钟摆：中美 双边关系的坐标与定位

不少人常用“既爱又恨”情节和“钟摆”理论来形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将其形容为确立双边关系发展的坐标。我们可以从经纬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中的含义。

就“经”向而言，中美关系既是中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但也是最难处理的国家战略之一。1949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

(1) 全面对抗（1949—1972年）。当时政治上的敌视状态不仅造成双方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军事交手，而且在经济上也断绝了一切往来，意识形态上也针锋相对。

(2) 解冻建交（1972—1979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由此结束对抗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3) 正常化交往（1979—1989年）。1979年2月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揭开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新篇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国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开始了广泛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4) 重重危机（1989—1996年）。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和恶化。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依然坚持“斗而不破”的对美政策。美国也作出“全面接触”的政策调整，希望把人权与贸易问题脱钩。但是1995年美国公然违反

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国被迫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中美关系也降至建交后的最低点。

(5) 风波迭起 (1996 - 2001 年)。为了处理危机，1996 年以后中美之间高层接触增加，两国关系在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后大有改善。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新评判，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这样大型的结构理论。对此，中国坚持自己“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从容应对。

在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问题上，笔者认为，建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收获，乃是中国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对双方战略纽带支点的定位转换，即从联手遏制前苏联扩张，到强调新时代经贸交融与地缘安全这些利益交汇点的重要性。这个定位的成功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对美政策制定的基本走向。

就“纬”向而言，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把现实追求的具体利益同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目标混在一起”，而围绕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内部也展开了种种错综复杂的争论。^① 概括地说，有这样三种观点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即：

^① 参考文献包括：Barry M. Rubin and Elizabeth P. Spiro, eds.,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1979; 詹姆斯·比尔德：“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远见”，《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8 年第 2 期，第 23 页；张睿社：“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中国外交》，2000 年，第 6 期；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华宏勋、闫循华等主编：《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第 8 - 10 页。

(1) 所谓重视“高度政治”的强硬现实派人士们认定，军事力量、国家实力是国际体系的基石。他们即使不反对同中国合作，也强调要保持同日本和韩国的联盟，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强调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

(2) 强调“低度政治”的温和派人士觉得，经济和科技实力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根本因素。为此，他们主张应当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鼓励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贷款，同时在环境保护等其他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当然，在感觉到美国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也肆无忌惮地声称要“制裁”和“惩罚”中国。

(3) 日益流行的“软性权力”观点的支持者们则呼吁，“观念的力量和它对思想的影响力，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① 他们支持“民主输出”，希望影响和“教育”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以此达到传播美国文明，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目的。在抢占“道德高地”、利用舆论造势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中国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同时将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要求中国给予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

上述观点的划分虽然过于简单，但却能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对华决策时并不像模式中的庞大而单一的行为者。其国内政治“黑箱”对不同机遇和挑战产生的不同反应，深深地带有“支离破碎、离心化，以及不平衡的实体”（fragmented, decentralized, and uncoordinated）决策的烙印。例如，在美国政

^①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纬、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府内部，主张对华相互合作、全面接触论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在行政部门；而对抗派的最坚定支持者在国会。现实主义者在五角大楼中居主导；经济至上论者在财政部、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一统天下。^① 这种状况，造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左右摆动，扑朔迷离。各种偏好杂烩其中，挑衅行为不断，结果陷入了行为狂热且激情有余，但却自律自制匮乏的自相矛盾的怪圈。

三、自许与期待：中美共同利益 与尚未解决的五大问题

中美关系犹如一个天平、一架平衡木，稍有不慎和失误，任何一方都会蒙受伤害。而双方态势、策略演变、危机处理及力量对比等因素，又像颗颗流星，冲击着双方合作与冲突的焦点。明白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是我们透视这百年历史的关键。

中美交往过程中反复出现过一些重大的主题，揭示了被毛泽东称为“有点良心的强盗”的美国与正在搞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利益，如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成长、促进国际投资与贸易发展、防止人类

^① 转引自苏嘉宏：《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美国晚近的美中关系研究之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4页。

环境恶化、遏制毒品的泛滥等等。^①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天真地期待两国的世界观和国家利益会达到一致，两国关系长期和谐。双方的利益既有吻合，也有分歧。

要消除歧见、积极合作，中美两国必须正视和解决以下困扰双边关系的五大问题：

第一，人权问题上的对抗与对话。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曾自豪地宣称：“只要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还在被奉行，就有美国心脏的跳动。”^②自立国之日起，美国就把自己当作是“自由的灯塔”；20世纪90年代更是制定了“民主扩展战略”以取代原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践踏人权”的国家，自然成为美国“圣战者”们的“征伐对象”。国务院、国会每年还要就中国的政治自由、强制堕胎、监狱劳动、童工、西藏等“人权问题”展开讨论、听证，并公布年度报告，试图将其与贸易、安全等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挂钩，对中国进行“孤立和惩罚”。面对指责，中国政府一方面顶住压力，针锋相对地与美国斗争，另一方面，也分别签署了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并准备认真加以执行。

^① David M. Lampton & Alfred D. Wilhelm, Jr.,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ryland, 1995, pp.1-20; 杨洁勉：“中美关系：回顾与反思”，《中国与世界》，第3、4、5期合刊本，1996年6月，第46页。

^② 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 Letters, Speeches and Papers*, Chicago: Times Book, 1965, p.45.

第二，“经济型政治”（econopolitik）驱动下的两国贸易争端。^①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在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问题上，美国一直漫天要价，有意阻挠；在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上，美国不顾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事实，片面将其归咎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设置进口贸易壁垒、出口劳改产品等；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美国曾数次对中国进行特别 301 条款调查，以中国违反知识产权为由列出报复清单。而中国则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产权法、商标法、版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并付诸实施。

第三，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对中国可能成为其战略对手一直存有戒心，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深感中国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出于这种考虑，有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在中美安全关系中被反复协商。例如，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向国际敏感地区出售或转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实际上，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不扩散问题上一贯采取负责的态度。1992 年，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95 年续约。1996 年，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并与美国等国家合作，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得以通过。

第四，最重要，同时也最容易引发中美直接冲突的是台湾问题。美国一直把台湾政权看成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两党轮替”在台湾的出现，又使美国认定台湾正在进行“民主转

^① Amy Borrus et al.: “Peddlers in Pinstripes”, Business Week, 1 May 1995, p.43.

型”，从而加大了与台湾官方的交往力度，包括提高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对台斗争即是对美斗争。中国对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立场上的模糊和“务实外交”策略，不仅提出了种种批评，同时还严正指出：为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对台湾的军事干涉，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第五，双方各自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中美两国围绕人权、经贸、安全和台湾问题产生的冲突，直接导致两国彼此国家形象的变形与走样。^①最让人迷惘的一个结果是，几经周折后彼此误解依然太多，以致于时至今日，“中美关系自1979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出现了领导保持冷静而中国公众观点趋向激烈的现象”。具体而言，很多美国人“要么把中国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只亚洲虎和可以给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的巨大源泉，要么把它视为世界上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是对自由和安全构成的下一个巨大威胁”。^②而在中国，众口一词的言论背后也同样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反美情绪，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充满了较为激进的辩论。

其实，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看法时好时坏。冷战之前，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是处于一种传教的狂热，希望这个古老的文明能够很快发生转变，加入现代（西方）文明。代表这种狂热的最佳例子是内布拉斯加参议员肯尼思·惠瑞（Kenneth

^① Steven M. Teles: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U.S. - China Policy” in Robert S.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s and U.S. -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M.E. Sharpe, 1998), pp. 40 - 69.

^② 转摘自《参考消息》，1999年4月8日。

Wherry) 在 1940 年的一次讲话：“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把上海提高、提高、再提高，直到它达到堪萨斯城的水平。”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形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每几年就有一个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吸引力使得美国和西方多数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充满浪漫气息。但 1989 年以后，反华浪潮一浪接一浪，冲击两国关系的堤岸。再以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飞速前进，“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 年）期间，美国也曾把中国看作是负责任的伙伴，但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大大增加，“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之类的论调流行于市。^①美国制定的“预防性战略”中的一个重大内容，便是调兵遣将，准备同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大打出手。

上述五个问题能否妥善地加以处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遵守双边和国际承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重新界定它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期望，避免把中国当作敌人。而中国，也应当借助对美交往中长期总结出来的经验，找到同美国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交往的有效方式，平衡地推动中国自身的价值观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①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四、“躁动的灵魂”：中美较量的未来

1900年，德国思想家尼采在世纪门槛上死去，但他宣告了20世纪传统宗教和精神世界图景的瓦解：“上帝死了”，人类成了“没有胸膛的人”。

美国曾是一个“有胸膛的人”。独立战争的洗礼不仅催生了一个新的国家，而且塑造了美国人民的自我形象。记得意大利记者奥里亚那·法拉奇曾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享有“电影明星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地位”，对此应作何解释？基辛格答复说，这要归功于他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这一事实。“这是美国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他说：

美国人所喜爱的牛仔，在率领一队马车时，总是独自一人骑马走在前面，一向是孤身一人骑向一座小镇，……只有他的马与其相伴，别无其他。有时甚至连枪都不带。

……这个牛仔无须非常勇敢。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单枪匹马，向别人表明他策马进入镇子，一切事情都由他亲自动手。……^①

从直观上讲，这种形象的确概括了美国人的孤独、自立、

^① 詹姆士·O·罗伯逊著，贾秀东等译：《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英雄浪漫气息和期待得到认可等优秀的民族特点。然而人类群体，正如个别的人类个体，持盈保泰远比艰苦奋斗更困难。历史上的雅典与晋国，都是在国势最盛时，自恃强大，竟因骄怠而走向失败的。今天，国家精英们越来越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使美国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承担义务与资源平衡这个核心课题。

20世纪末，前超级大国苏联的灭亡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战略真空带，美国外交防务政策也因此咄咄逼人，“官方的得胜心态”（official triumphalism）暴露无遗。^①加上在“和平红利”的强力刺激下，美国持续高速发展，“新经济”纪元的幻象使美国的新保守派们露骨而又异想天开地开始追求一种“霸权永续”的规划。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雏形，基本上是以全球主义、自由贸易以及民主这三个以单纯且直线的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变数构成的。不过，这三个变数仍无法帮助美国外交政策走出160多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的“托克维尔困境”（Tocqueville Problem）——美国的民主模式可能是世界上处理外交方面最贫乏的制度，如果美国外交政策过多地受国内因素的主导，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事务，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种人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种人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种人则需自身清白。”^②

^①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亚欧研究中心：《动态与分析》，第1期（总1期），2000年9月6日，第2-3页。

^② 转引自洪兵著：《剖析“美国利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美国的确像世界政治田野里的一头野象，不管朝哪边闲逛，都会践踏草地。可惜的是，自负的美国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前不久，美国民主党议员、参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拜登还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文章，大言不惭地说：“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参议员同事很喜欢理直气壮地说，‘你不喜欢我们？你认为我们没有素养？你认为我们想把意志强加于人？很好。你管好你自己，免得我们指手划脚’。”^①美国的强权外交、我行我素、夸夸其谈和傲慢无礼正在毁灭这个一度强大的国家。“9·11”事件造成的超级恐怖使美国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50年前，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应该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②但是，美国所追求的“世界模式的政治”手段依然被很多人顶礼膜拜，美国的政治制度也被看成是能够消除内部矛盾和冲突，同时运转灵活的万能体制。实际上，步入21世纪之际，美国的旧式爱国主义精神正在逐步丧失，技术的进步和心灵的迷茫混杂在一起。今天看美国，不乏政风堕落、政体腐败的案例。其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的日益衰落，又造成了奢侈和原始同时存在。美国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最美好的理想和精神，却无法抹去自身永远的痛苦和伤

① 转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20日，第6版。

② Lester Pearson, *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83-84.

疤——种族歧视、枪支泛滥、文化堕落、毒品威胁等等。

中国仅仅看到这些就可以了么？今天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已经成为一场环环相扣、竞争公平而又带些残酷意味的“奥林匹克竞赛”。说环环相扣，是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当代外交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两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对适合自己的国际行为与职责的自我界定直接影响着对方自我角色的评估和国际关系的走向。说竞争公平而又带些残酷意味，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本来就充满以利相诱、以害相胁的功利心态，但是今天能够堪称世界大国的国家必须具有一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实力。国际社会既不允许美国一意孤行、随心所欲地奉行“点菜”式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也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后变成缺乏恢弘和从容气度的“国际新贵”。由此可见，虽然中美双方内部都有一些“躁动的灵魂”，但是“以尊重的精神”处理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应是达到“和则共赢”的最佳途径。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成帅华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朱明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任 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庄建中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孙 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纪康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蕴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